

·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

十六和十七世纪
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
中国景观

「澳门」《文化杂志》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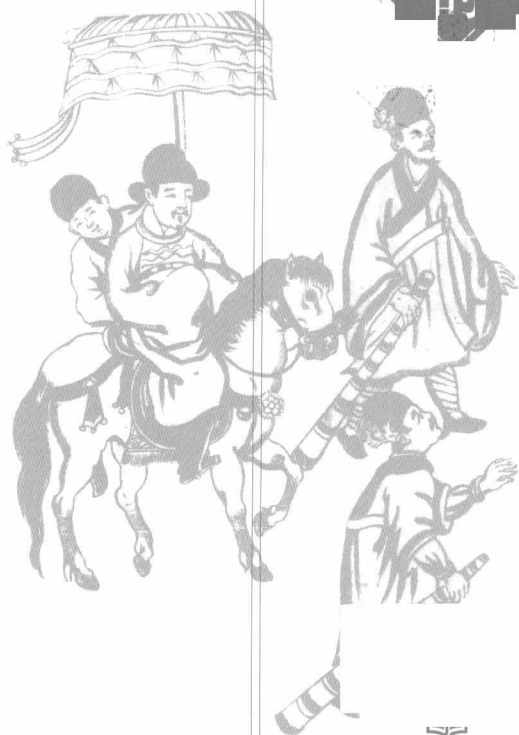


大象出版社



十六和十七世纪
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
中国景观

「澳门」《文化杂志》编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
澳门文化司署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7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ISBN 7-5347-2780-4

I. 十… II. 澳… III. ①汉学-研究-西班牙文集②汉学-研究-葡萄牙-文集 IV.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4532 号

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

责任编辑 郭一凡

责任校对 张吴霍

书籍设计 张 胜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制版印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38 千字

印 数 1—1 600 册

定 价 19.80 元

总序

任继愈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① 文明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我所用的情况。这种水平相当的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往往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明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在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在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其可用者为我所用。当国势衰弱,文化停滞,科学落后时,往往

^① 第一次在汉朝,公元前后1世纪,开通了丝绸之路;第二次在唐朝,公元7~8世纪;第三次在明朝,公元14~15世纪;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19世纪;第五次在“五四”前后,20世纪初到现在。

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成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鸦片战争以后,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也有些是中国所不愿接受的,也有些是被迫引进的。

历史告诉人们,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世界上一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全世界都会受到震动。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紧密程度,却也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趋势。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大超过古代,传递手段之迅捷,古人无法想象。因此,文化交流的责任也远比古代社会沉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负担着 21 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艰巨任务。

为了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全面状况,本书系分为三个系列:

-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翻译);
- 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翻译);
- 三、海外汉学研究(著作)。

“汉学”这一名称,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也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总之,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之内的学术著作。正如“现代新儒家”,这个名字的内容,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本书系也将包括这类译著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愿借这个领域,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梁,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

我们这套书系,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高品位的世界文化。21 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向世界推进文化交流,我们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只有在健康、光明、理性、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引下,人类才可以避免失误,走向和平。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战争的罪恶。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正直善良的学者,出版这套书系,期望其社会效益不限于书斋以内,更寄希望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光明的大道,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编辑委员会

- | | | |
|-------|---------------------------|-----------------------------|
| 顾问: | 陈乃芳 (Chen Naifang) | 陈翰笙 (Chen Hansheng) |
| | 季羨林 (Ji Xianlin) | 李学勤 (Li Xueqin) |
| | 饶宗颐 (Rao Zongyi) | 汤一介 (Tang Yijie) |
| | 王元化 (Wang Yuanhua) | 周一良 (Zhou Yiliang) |
| 主编: | 任继愈 (Ren Jiyu) | |
| 执行主编: | 张西平 (Zhang Xiping) | 周常林 (Zhou Changlin) |
| | 耿昇 (Geng Sheng) | 杨煦生 (Yang Xusheng) |
| 编委: | 柴剑虹 (Chai Jianhong) | 程裕祯 (Cheng Yuzhen) |
| | 高建平 (Gao Jianping) | 何其莘 (He Qishen) |
| | 李明滨 (Li Mingbin) | 孟华 (Meng Hua) |
| | 任大援 (Ren Dayuan) | 黄勃 (Huang Bo) |
| | 吴隽深 (Wu Junshen) | 谢方 (Xie Fang) |
| | 严安生 (Yan Ansheng) | 阎纯德 (Yan Chunde) |
| | 严绍璈 (Yan Shaotang) | 杨保筠 (Yang Baoyun) |
| | 张德鑫 (Zhang Dexin) | 张国刚 (Zhang Guogang) |
| | 周发祥 (Zhou Faxiang) | 汪前进 (Wang Qianjin) |
| 国际编委: | 李福清 (Boris L. Riftin) | 何莫邪 (Christoph Harbsmeier) |
| | 孟德卫 (David E. Mungello) | 许理和 (Erik Zürcher) |
| | 常志静 (Floria C. Reiter) | 杜德桥 (Glen Dudridge) |
| | 陈志让 (Jerome Chen) | 施舟人 (Kristofer M. Schipper) |
| | 谢和耐 (Jacques Gernt) | 柳存仁 (Liu Ts'un-yan) |
| | 钟鸣旦 (Nicolas Standaert) | 罗致德 (Otto Ladstätter) |
| | 魏丕信 (Pierre-Étienne Will) | 史华罗 (Paolo Santangelo) |
| | 安乐哲 (Roger T. Ames) | 陈荣照 (Tan Eng-Chaw) |
| | 罗多弼 (Torbjörn Lodén) | 杜维明 (Tu Weiming) |
| | 弥维礼 (Wilhelm K. Müller) | 伊维德 (Wilt L. Idema) |

中文简体版序

张西平

伊比利亚半岛位于欧洲大陆的西端，葡萄牙人把最西端的罗卡角称作“欧洲之角”。葡萄牙的著名诗人卡蒙斯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大地在此结束，海洋由此开始。”

人类海洋时代的序幕也的确是由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拉开的。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哥伦布怀揣着《马可·波罗游记》，扬帆驶向了大西洋，去寻找那香料堆积如山的刺桐港，梦想能见到契丹的大汗，递上西班牙国王给大汗的国书。但他却阴差阳错地到达了墨西哥，发现了美洲大陆。与此同时在年轻的葡萄牙王子恩里克的支持下，葡萄牙的三桅帆船沿着非洲西海岸不断向前推进，几年后大航海家达迦玛就绕过了好望角，驶入了印度洋，占领了印度的果阿。当葡萄牙人穿过马六甲海峡，先在中国的宁波海岸，继而在澳门站稳脚根时，西班牙人的大帆船也已经从墨西哥横渡过太平洋，占据了吕宋岛，开始在福建沿海和中国人打交道。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这两个小国在南中国海会师，标志着世界合围，世界的全球化由此开始。而全部大航海时代的灵魂，二百年航海史的主旋律就是：寻找契丹，发现马可·波罗所说的那富饶的东方。

当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时，他们留下什么印象呢？他们眼中的东方是什么形象呢？葡萄牙当代历史学家洛瑞罗所编的《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给我

们展开了一幅丰富的历史画卷。这里有历史学家如实的记载,有冒险家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有商人们贪婪的眼光里对中国财富的描述,有传教士的日记,有文学家的梦想……

在澳门回归之际,国内学术界出版了多种有关澳门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著作,但正像澳门史专家汤开建先生所说的:“事实上,葡萄牙人关于中葡早期通商的记录远比中国文献的记录要详细得多。”因此,葡文方面关于中葡关系的早期文献就显得格外重要,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做的最为突出的是金国平、吴志良的一些译著和著作,而洛瑞罗所编的这本文献是葡萄牙学者中最为重要的一本。

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来看,书中大部分材料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最早对中国的记载。像葡萄牙首任赴华大使皮雷斯的《东方概要》、巴洛斯的《亚洲十年》、卡斯塔内达的《葡萄牙人发现和征服印度史》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而维埃拉的《广州来信》、佩雷拉的《我所了解的中国》、克鲁斯的《中国概说》则是西方来中国的第一批冒险家的回忆,史料真实可靠。如果写1500年以来的中国和欧洲交通史,离开这些文献几乎无法动笔。

传教士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桥梁,正像古代的僧人是中国和印度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一样,这点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十分重要。洛瑞罗教授对此十分清楚,传教士的文献在他编的这本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入华耶稣会士孟三德的《日本天正遣欧使节团》可能是利玛窦对中国介绍的最早欧洲文献,而入华多明我会士费尔南德斯的《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一书不仅是西班牙早期最重要的汉学著作,也是“礼仪之争”中最重要的文献。

从大航海以来,中国的历史已经不能在自己原有的框架内书写,中国的丝绸通过西班牙的大帆船运往欧洲,直接冲击了欧洲的纺织业市场,中国早期的工业已开始有了简单、初步的世界市场。我们应该从世界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只有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历史,才能真正认识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了

解中西交流的历史,这本书则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中西初识时的最原始文献,提供了以澳门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贸易的第一手材料。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名言绝不是是在赞扬一种主观的历史观,而是在说明揭示历史真相的困难。19世纪以来世界史的书写基本上是在欧洲中心主义观念下完成的,世界近代史不过是一个始于欧洲的全球化过程,一些本是欧洲自己地域性的经验被提升、演绎为世界性的普遍性理论,同时,在世界历史的进步中各种文明之间的互动不见了。实际上的前近代和近代世界史并不完全是这样,前不久在国内引起争论的贡当·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去年在美国汉学界引起热烈讨论的彭慕兰的《大分流:1500—1800》都是从世界全球化的起始的300年历史入手,说明世界史的复杂一面,努力揭示东方,揭示中国在整个世界史中的作用。中国学者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的《江南早期的工业化》则从中国的材料说明这一点。其实,西方早期的世界史观也并不是今天这个样,欧洲的第一部世界史著作是伏尔泰的《风俗论》。这位18世纪欧洲的思想领袖的世界史是首先从中国写起的。坚信其从欧洲社会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人类发展的五阶段论的马克思,在晚年读到俄国公社的材料时,受到极大震撼,不得不放下《资本论》的修改,而去研读东方。因为,欧洲的经验不能解释整个世界史。

如何把中国放入世界,如何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重新绘制全球化史的历程,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给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明清史提供了新的史料,也为我们展现了全球化起始时的东西方的互动的历史,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眼光。

一些西方学者为西方文化优于其他文化编制了许多神话,似乎今天西方文化的一些优势在娘肚子里就有,其实并非如此。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始终是在相互影响中发展,在相互交流中共生。在

1500—1800年的西方文化演进中,中国文化就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君若不信,就可读读洛瑞罗教授这本书。

据有的学者研究,当时中国经济约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其富足和强大令东来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吃惊。皮雷斯在《东方概要》中说:“据东方国家讲,中国物产很多,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宝藏丰富,讲究排场,铺张奢华,使人以为那是我们葡萄牙而不是中国。”这里还有点夜郎自大的味道,但不到三十年,奥索里奥在《光荣之歌》中就已经变为:“我们中间那些曾经同中国人有过某些接触的人说,在城市的雄伟方面,在建筑的华丽方面,在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方面,或在对各种艺术的浓厚兴趣方面,在如今世界上很难找到某个民族能同中华民族匹比。在印刷术方面,人们几乎不知道他们在多少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使用金属活字印书了,而我们只是在不久之前才开始使用这种技术的。”巴洛斯在《亚洲十年》中对中国的技术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特别是在治国之道和在金属、木工、纺织、丝绸织造方面的技术,必然会感到这个世俗国家的一切皆可与希腊和拉丁媲美。”

打动这些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不仅是物质的富庶和技术的发达,还有中国文化和制度,曾德昭在《中华大帝国记事》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私塾情况,他说:“中国人从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初学者用几本很简单的书,课文的内容是关于美德、良好习惯和遵从父母和老人等等。几个月后教他们古典作家们的作品,这些作品像圣经一样,正文和评注在一起,学生们要记熟,然后由老师讲解。……他们的学习极为严格,任何人都不得消遣娱乐。”

特别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对于在官僚制度上还处在世袭制的欧洲来说是相当新鲜的。奥索里奥在《光荣之歌》中是这样介绍中国的文官制度的,他说:“中国人十分重视教育,如果不把最高的权力交给那个被证明具有管理一切之有文化能力的人,那就将被视为非法。在授予某个人(管理和统治的)职位时,绝不考虑其家庭或其所拥有的财富,而考虑他的学识水平。因此,所有希望获得即使是(管

理和统治的)最下层的职位,都得进行刻苦学习。当他们认为已经取得了不会令自己丢脸的进步之后,就到某些专门指定的考官那里去接受考核。通过这些考官的裁定,他们或因文化水平不够而被淘汰,或因学识渊博而得到某种荣誉奖章。然后再从这些人中挑选佼佼者担任管理小范围的职责。”“经过考试,被认定为有才干、高文化水平的人是很多的,但通过各级的学识考试,能够到达最高职位的人是不多的;达不到的人中,大部分是因为天赋所限,同时也有不少情况是因为运气不佳。至于那少数脱颖而出的精英就将占据最高的行政职位,就会被置于权力的顶峰。”

现代学者们研究考证西方的文官制度受启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他们系统研究了当时有关中国文官制度后,结合欧洲的情况而创造出来的,是一种“有欧洲特色”的文官制度。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又到了我们学习西方的文官制度,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体制的时候了。

当然,初到中国的洋人们也并不是一味地歌颂中国,他们觉得中国的女人们很漂亮,但女人的小脚让他们反感,尤其是中国人对上帝的不敬,沉醉于各种各样的迷信使他们感到中国人的堕落和无可救药。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任何异国的形象都是受描述者自身的意识形态所影响的,都是从自身的文化需要出发来解释的。刚刚驶出地中海的西方人正在走出中世纪的城堡,东方的新鲜空气,使他们兴奋,使他们新奇,这本书使我们看到西方人第一次与中国相遇时的真实情景。其实西方的文化历史就是不断融合其他文化的历史,基督教文明诞生在东方,尔后传入西方,对其产生了根本影响。罗素早年也曾说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效仿拜占庭帝国。”这说明欧洲对待其他文化,对待东方文化并非一直是现在这种态度。因此,就西方来说,如果同东方对话,首先应放弃近

百年来所形成的“欧洲中心”，那种无视其他文化，蔑视中国文化的态度。近百年来西方文化的东方研究很大程度上都受这一心态的影响，如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东方学》中所说的，欧洲的东方知识，即对东方的认识是伴随着欧洲的扩张，欧洲的殖民过程一起产生的。而19世纪是欧洲人的世纪，整个东方都受到欧洲殖民主义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对东方的认识不可能是平等的和公正的，在西方人眼中“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西方是典型的“变色龙”。

西方人应抛弃“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以一种平等的心态看待东方文化，看待中国文化。在这方面西方历史上是有经验可借鉴的，本书中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描述，以后利玛窦所做出的“文化适应”政策，都已为今天的西方人做出了榜样，这些人华传教士已经探索了一条平等对话之路。

例如，就利玛窦来说，他并未放弃他已有的文化立场，他仍希望中华归主，他在中国活动的目的仍然是为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但他确立了一种对待异于基督教文化的态度，即对中国文化是尊重的，对它的悠久和博大是称赞的。对不同于基督教的中国文化他是理解的、宽容的，他没有站在一种狭窄的基督教立场上对中国文化异于西方文化的部分采取完全排斥。如在祭祖祭孔问题上，他是赞同中国教徒这样做的。即便对于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相分歧的地方，他也没有采取一种不理睬的态度，而是采取积极对话的态度。如他对佛教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理论上的对话；又如他对宋明理学的批评，也是一种研究式的态度，而且这种批评并没有妨碍他同理学家们很好地交往。

这种较为平等的态度还表现在欧洲思想文化界在17—18世纪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上，他们崇拜孔子，赞扬儒家的自然宗教，对中国伦理交口赞扬。这在伏尔泰那里，在莱布尼茨那里表现得十分突出。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当然有其自身文化的原因，但那时西

方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与19世纪的态度完全不同,更多表现出一种平等对话的态度。这说明西方文化若采取一种正确的对话态度,应放弃现在的“欧洲中心主义”,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调整文化心态,这才是正确的出路。《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可以使一些西方人看到四百年前他们初到东方时的态度。历史是一面镜子。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绝不是满足于一种历史的陶醉中,但从这段历史中清洗一下在我们头脑中久已存在的殖民主义话语,还是有价值的。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他们根据自身的需要塑造了一个中国的形象,把中国作为“丑恶的”和“批判的”,这一切都是西方从自身文化出发的,这种被曲解、想象了的中国是作为西方自身文化的“他者”出现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自己的文化不需反省,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反省时,又要警惕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对我们的影响。实际上,这种警惕是不够的。近代以来西方已经把他们的这种中国形象输入给我们,强加于东方。这样的中国观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国,从而把中国纳入了西方文化的权力结构中。这种西方的话语系统严重影响了对自身文化的认识,“五四”以来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分法实际就是这种殖民主义话语在中国文化中的反映,按照这种二分法理解,西方等于现代,中国等于传统,要现代化就要抛弃传统,全盘西化。显然按这个思路,很难谈得上什么对话,因为这是“无差异”的现代化,是中国文化将被完全丧失的现代化。我们应看到,这种思路至今仍限制着我们。

或许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些,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叙事中看待西方,反省自己会好些。在天天讲全球化的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到全球化的起始岁月,抖掉那历史的尘埃,重看一下中西初识时的场景吧。

羊年初一写于郑州家中

编者前言^①

《文化杂志》总编辑

官龙耀

鲁伊·洛瑞罗教授作为本期文献专辑的选编者,对入选文章所作的说明性和导论性的按语与序论,已足以代替本期《文化杂志》的编者前言了。本期文献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已囊括在他的序文之中,他向读者阐明了作者与编年史关联的时空背景,并为读者对所述事实的深入解读做了引介的铺垫工作。

《文化杂志》出版这样一个专辑,除了内容紧凑而激动人心之外,特别是为中国的历史学者提供了一束资讯性质的视焦,借此可以更好地明了葡萄牙人民同中国相接触以及加以了解的初期情况,并对由此而引发的“相互理解”作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提供可能,并予以激励。为此,本刊亦深感荣幸有加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献选编者的初衷就是想挑选带有赞美色彩的文章。这种色彩,几乎自始至终一成不变地贯穿于这些按照编年序列组排而历时大约 150 年的对中国所进行的“观察”的报道之中。早期的“观察”,并非属于直接性的,后期则是目击者置身于当地生活的真情实感。

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曾以世界各民族和诸文化国际交响曲之中

^① 此为 1997 年澳门《文化杂志》出版的专刊《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文献选集》的编者前言。——出版者注

的超级文明者自居。为此,她沉迷于一个帝国的庞大和精巧之中,以表明她在文化和社会、政治等广阔领域的优越地位。

根据国家的架构,以及诸如“天之等级”或“神圣的官僚体制”等观念,建起了宏伟的行政金字塔,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文字的共和政体”,以皇帝为其顶点,形成了过去文明史的典型模式。

中华帝国衰落的原因尽管总是神秘莫测,其讳莫如深之处亦有待澄清,然而,在葡萄牙人抵达澳门之前不久,其历史时刻便已明朗化了。在我们看来,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漫长的探索和思考中,并未对造成中国科技落后状况的现象作出完满的解释。就在那个时期,欧洲的科技状况则与中国社会进步的逆转恰成对照。

我们认为,无论如何,事实似乎是这样的:如果说,早期军人、商人和传教士的文章有所神话化的追述曾经引起对“中国方面”的诱惑作用的话,那么,在后期,耶稣会士的著作家们的某种叙述方式则是为延续其远东传教的专利作出辩护而提出的一种“资讯策略”,正因为这一点,他们成为其他教团妒忌甚至嫉恨的对象。

许多编年史家的评价集中在两个“可鄙”的方面:传说的中国人盛行鸡奸;或者说中国人的外表“孱弱不堪”。

旁人的第一印象总是肤浅的,并且视焦往往会发生偏移:观察者的透镜往往呈现主观的色彩。上述两个事例无疑是由旁人自以为是的道德教条和浅薄的人类学、文化学传统知识所造成的。

伟大的中央帝国朦胧地呈现于葡萄牙人的眼前。首先呈现的是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迷人情景:这是一种伟大的、中庸苟且而又辽阔无际的农业文明;一派女性(或阴性)的世界景象,这个世界中的一切都带有此种象征的特点并受其制约。

我们总是在其历法的节律之中,在政治权力的戏剧化搬演之中,在军事力量的峥嵘显露之中,在攻击性强势升华为礼仪的至高无上之中窥见了中国特色。

需要暴力强制、镇压行动的强权是虚弱的。相反,皇帝理应受到尊敬,对他要无可争辩地服从。他身上汇集着令人生畏的威严,

这是神赐予的力量，根本无须解释。他体现着权力的至高形象，是一种全然外化了的的天意，一种绝对的轴心：是最纯粹的“阳”的化身，是天之骄子。

正如中华帝国邻近诸国之臣服于中国，全国各省府乡镇和家庭均俯首听命并绝对地服从于天子。

从这种权力礼仪化的最高形式中，从这种在中华帝国国境线内外的强势和攻击性力量中衍生出来的，是一种良性的被动形态，一种中国式的和平，从而升华为道德诫谕的观念。

郑和举世无双的海上航行，目的并非野心的扩张膨胀，而是以这种方式作为向中华帝国的臣属国家再次炫耀其伟大国力的需要。

在早期的西方人看来，中国男性在某些社会习俗和行为规范上似乎太女性化了。而西方男性则完全处于一种凶狠好斗的文明圈中，然而这种文明早已失去了骑士道德的义勇遗风。

中国的耶稣会士编年史家，满怀道德信条，并将其信条与圣经惩罚的熊熊烈火联系起来，面对“丑陋的罪恶”，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基督教曾经力图使人忘记希腊、罗马和东方的强权国家。

事实上，从中央朝廷到各个总督大臣的衙门，皇家太监是权力中心极端化的某种体现。在中华帝国，皇妃寝宫以太监为侍仆是普遍现象。据《周礼》记载，这种惯例源于周朝（公元前1100年—前256年）。在1460年一次同南方苗族（Miaos）的战役里，就俘虏了一千五百六十五名青少年男子，全部被阉做了太监。

在皇宫那重重帘幕背后和重重迷宫之中，千百名太监同皇帝的宠妃结成天然的联盟，变得愈加缺乏男子气概，然而宦党的权势却越来越膨胀。有时，太监大耍阴谋诡计，刺探内情，串通勾结，玩弄权术，在宫廷皇室的小范围内，聚集与扶植特种权力，变得越来越有威势。

晚明时期，耶稣会神父进驻北京皇宫，耳闻目睹了特别是从永乐皇帝开始的被宫闱太监腐朽力量侵蚀得极其衰败的朝廷内部情景。同类现象在以前朝代的灭亡中也曾经发生，如东汉、唐朝和宋